

广播电视史研究

广播史学研究刍议

广播电视史作为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历史科学，目前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已经占有一定的地位。它不仅为广播战线系统研究过去的经验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理论依据，也为有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必要史料线索和史实。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广播和广播史学的研究工作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价值。如何正确认识广播史学在历史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好地发挥广播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使其研究成果得到有效的利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就这些问题谈些粗浅认识，以就教于广播界。

—

什么是广播史学？在下定义之前，应该明确以下问题：其一，什么是史？我们所讲的史，即历史。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它包括自然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两部分；狭义的历史是指某一事物自身发展中所显示出来的历史过程。广播自 20 世纪初问世到现在已经有 80 多年了，它同世间其他事物一样，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自身的发生发展历史。其二，任何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表现出与其他事物不同的规律和特点，不同的研究对象产生

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广播发展的历史以及给广播史学下定义时，应该注意到它的特殊性。广义的广播史学是研究人类利用无线 有线 电波传送声音图像借以播送新闻、政论、文艺及广告等节目的整个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一门历史科学。

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揭示人类历史运动发展的规律性。广播史作为一门专业史，是从广播这个领域进行系统的、深入具体的研究探讨，为人们展示这方面的历史现象和规律。广播史作为一门科学，与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广播史的研究对象是广播技术的发明和进步，广播电台的设置沿革、广播节目的编排制作的发展情况、广播宣传的方针政策的发展、广播宣传的作用和影响、广播理论的演化、广播管理经营的改进及其法律条令的制定。总之，广播史是从广播诸方面去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揭示人们开创和发展广播事业的历史活动的某些内在联系和特点。

广播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本应该很好地加以研究总结，但遗憾得很，对于这门科学，过去我们对它的认识研究很不够。主要原因是有些人认为广播无学，广播史就更没有学问可言了。产生这种说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因素也有社会因素。那么，广播史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呢？它能否作为一门科学而独立存在，或者说，创建广播史学究竟有没有根据？对这个问题不作出明确回答，广播史的研究和建设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大家知道，任何一门科学的建立必须有与之对应的实际存在的客观对象。例如，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生态学的对象是生物的生存条件及其生存环境，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客观对象。

当然，一门科学有了与之对应的客观对象还不能说就有了存在的根据。现在，有人提出一种看法：作为一门科学对象的客观事物，必须是，第一，这种客观事物存在必须是一种普遍的事物，或者虽非普遍存在，但却是一种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物；第二，这种事物应该是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即对于它的存在的研究，可以为人类造福，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

根据上述要求，我们来看看广播史学。广播（电视）史与之对应的客观事物就是人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全部广播活动。广播活动自 20 世纪初至今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具备了建立独立的历史科学的条件。首先，广播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并将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向前发展。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微波通信卫星技术在社会上的广泛运用，使广播电视技术和设备的发展更为迅速。目前，广播电视已经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广播电台 2.6 万多座，各种收音机 11.6 亿架以上。按世界人口平均，大约每四个人一架收音机，每十个人一架电视机。广播电视普及速度之快，发展规模之大，是其他传播媒介所无法比拟的。要让人类很好地利用广播电视，使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不仅要注意研究现实的广播电视的工作情况，还要了解广播电视从产生到现在这段的发展历史，记录、整理、分析历史上广播（电视）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总结出一套好的经验供今天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参考。这样一来就必须要建立一门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学科——广播史学（或广播史）。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广播电视历史已经予以重视，并积极开展研究、著书立说。美国已经出版了《美国广播史》（艾利克·巴瑙著）、《美国电视的演变史》（同前），日本的《日本广播五十年》、《电视视听三十年》（日本广播协会）、《民间广播三十年》（日本民间广播联盟编）等已经相继问世。近些年我国在广播

(电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仅在新闻专业大学本科、专科生和研究生中开了“中国广播史”课,还先后出版了《中国广播简史》(赵玉明著)、《中国现代广播简史》(赵玉明著)、《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广播电影电视部《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著)、《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中国的广播电台》、《中国的电视台》(《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著。这些书对解放前后我国的广播事业的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已经成为广播战线和有关方面学习、了解我国广播事业历史的重要书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省地方志和《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等重要书刊编写任务的促进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广播电视史志的编写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编印出版了一些书籍。除了我国大陆的研究外,台湾在这方面也有所进展,例如《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史》(温世光著)就是其中一例。以上所述表明,广播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已经逐渐被人们认识,建立并发展广播史学已经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任务。

其次,广播活动本身与人类生活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广播节目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多样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1986年夏季北京地区广播电视听众的视听调查报告提供的资料表明:北京市民中有71.9%的人,主要新闻来源是靠广播电视,高于报纸和其他传播媒介。我们在广播宣传中,一方面要加强对现实工作的调查研究,及时改进广播节目,另一方面要注意不断地总结过去的经验,使广播宣传工作从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得到发展。广播史学正是从历史的角度承担对这项事业的考察与研究工作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建立并发展广播史学是顺理成章的。

根据上面所述,可以归结出两点:第一,广播史学作为一门历

史科学，有与之对应的客观对象；第二，这个客观对象也具备建立一门科学史学的条件。因此，建立和发展广播史学已势在必行。

二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科学，因此可以说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特点，因而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事实证明，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历史科学，发展历史科学对于推进我们的各项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广播史学也是如此，我们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看待广播史学的作用的。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一切事物都是作为一定的具体的历史过程而存在的。广播从问世至今，已经形成了它独立存在的历史过程，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给予充分肯定。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有必要谈谈广播学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问题。

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史学研究中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学术价值是指历史科学本身发展中的价值；社会价值是指客观存在的历史，通过史学工作的研究，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就广播史学来看，我们研究广播的产生发展历史过程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通过对广播历史形成过程的理论分析、史实的考证等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原貌及内在规律，并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and 影响。

历史上人类的活动不仅表现为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还表

现为极其丰富的科学文化活动，广播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的精神文明活动的发展情况（广播技术的提高，也反映了物质文明的进步）。广播活动是历史的产物，它有自己的发展史，也有与社会多方面联系的发展史。例如，广播活动是怎样产生的？它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就要通过历史的考察来解答。又如，我国民营广播发迹的 30 年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对它有哪些促进作用，也要通过历史的研究来解答。解放后我国的广播宣传取得过成绩，也有过失误，这是为什么？党的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对它又起过什么样的指导作用？这些都要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来解答。人类的历史活动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类的历史正是由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交织而成的。广播史的研究成果丰富并深化了人类的文化史，文化史的成果又充实了广播史的内容并补充了人类的综合史……发展广播史学既是广播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丰富完善人类历史的需要，它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还应该看到，如何对待历史和历史遗产，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广播事业既然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那么，对于人类在这个领域所进行的工作以及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我们要加以珍惜，要进行研究并给予正确的评价和总结。我们应该从研究广播活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去窥视人类科学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进步，认识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能动作用，理解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繁荣，这也正是研究广播史的目的所在。许多事实证明 人类要进步 民族要发展 就不能割断历史，忘记历史。因此，我认为，人类活动中既然有广播生活的天地 那么 我们在史学研究中 就应该把眼光投向这个领域 给它开辟一席之地，使广播和广播史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处于同等地位，共同发展 这样才能使伟大的人类历史更加充实 更加丰满。

再从历史科学研究领域看，对于人类所涉猎的各种领域，基本上都在历史科学上得到了承认。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生活本身就表现为多方面、多层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史科学赋予各个领域的任务所必需的。目前世界上在历史科学上占比重较大的是文学史、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广播史所占比重相对来说很小。我们现在研究广播史的任务之一，正是要填补历史科学中的某些空白或薄弱环节。在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进一步确立它的史学地位。

广播史学的社会价值则有积累知识、借鉴经验、思想教育及向社会其他学科提供史实和史料线索，帮助分析认识问题等多方面的含义。

第一，传授广播历史知识，提高广播队伍的业务素质。人类历史是由古到今、由远而近演化而来的。我们要认识现在，预见未来，不能不了解历史。要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积累知识、增长智慧、做好工作。这也正是历史科学的社会价值所在。广播电视等现代化的传播媒介近二三十年有了异乎寻常的发展。为了适应这种发展需要，就要努力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广播电视工作者，这其中也包括向他们传授广播历史知识。很难想象，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会干出出色的工作。古罗马政治家兼作家西塞罗说：“不知道你出生之前的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他这话虽然有些严重，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广播等历史知识，在国际交往中所问非所答闹出笑话的也大有人在。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教育干部要注意学习历史知识。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可见，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1页。

掌握历史知识很重要。

第二，借鉴广播历史经验，把广播电视办得更有特点。人们常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影子，这说的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研究广播的历史，可以使人们通晓历史上广播的成败得失，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在工作中减少盲目性，增强科学性。建国初期为了办好广播节目，广播系统曾提出过“自己走路”的方针，并收到一定的成效。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方针没有坚持实行。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改变广播宣传的被动落后局面，广播工作者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重新提出“自己走路”的方针，加以贯彻使中央台和各地方台的节目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改旧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这个事实说明，借鉴广播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可以使广播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此可见，重视广播史学的研究和发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广播的过去和现在，即对国内外的广播情况有全面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把我国的广播事业办得更有自己的特点。

第三，发挥广播史学的教育作用，对广播战线年轻的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优良传统教育，培养人们的自信、自立和自强精神。长期以来，社会上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史学与现实距离较远，与现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没有什么关系。事实并非如此。古往今来的许多事实说明，历史传统教育在培养人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爱国主义精神和优良传统不仅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所必需的，在发展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广播史上，中国人民为维护我国的电政主权不受外来侵略，同帝国主义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样的史实，正是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同样，战争时期人民广播坚持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正是向青年进行优良传统教育的重要内

容。广播电视战线现在有 20 多万大军 绝大多数是青年 要使这个队伍在广播工作中发挥作用，既要靠行政领导和组织措施，又要靠正确的思想引导，这里就包括进行广播历史的传统教育。用具体生动的事实进行传统教育，才能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增强责任感，认识到人民广播事业来之不易，决心为之奋斗。

第四，广播史学的研究成果不断走向社会，为社会提供服务。随着广播史研究工作的开展，社会对它也更加注意。近几年社会上一些有关的科研项目，都积极吸收和利用广播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大型丛书《当代中国》、《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新闻事业史》等等，都注意吸收广播史方面的成果。另外，前不久在延安建立的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利用并展出了许多广播史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此外，文学创作、影视剧本等也直接或间接利用广播史的一些成果或参考资料。广播史学直接或间接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正在扩大，这标志广播史学的社会价值正在向多方面发展，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为社会所承认。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广播史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同的，但它们并不各自独立存在，而是常常融在一起。因此，我们对二者必须给予同样的重视。许多事实证明，广播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互相依存的。它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远的不说，就拿近几年广播史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人员对抗战时期我国存在五种类型广播的研究，对中国人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的考证，都取得很大成绩。这些成果弥补了我国广播史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些成果也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再如，有关人员这些年对延安 陕北 新华广播电台进行仔细认真的研究 成果显著 写

出一系列专文。这种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搞清了人民广播的创建日期，而且也总结出战争年代人民广播工作的某些规律和特点。这些成果一方面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表明了我国广播史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另一方面，把这段历史公诸于世，使后人更加缅怀老一辈广播工作者和重视他们的宝贵经验，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工作。这种研究对今天广播战线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说明它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充分发挥广播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作为科学的史学本身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在研究中，只要不混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尊重历史的原貌，求实存真，那么，广播史研究的社会价值实现得越好，它的学术价值也就越高，从而能促进广播事业的发展。

三

广播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历史科学，正处在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之中。我们在研究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为指针，同时也需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化科学理论和方法。只有很好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辅之以现代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系统理论、系统方法，就可以促进广播史学的研究和发展。

另外，发展广播史学还要注意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人类的广播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各方面都有广泛的联系，因此在研究时，不要把自己只限制在广播这个小圈子里，这样研究的路子就会越来越窄。我们要在加强广播自身历史的研究总结的同时，加强广播与它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这样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和多学科进行的综合研究，会使广播史学的根子扎得更牢，基础打得更厚实。广播从产生到发展与无线电

技术、音乐、戏曲、教育等发生过许多联系 那么 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广播为轴心，在这些方面做些文章呢？再如，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不能说与广播电视没有关系，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从广播史的角度加以印证呢？总之，要把广播史研究引向深入，就要注意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提出新的对现实社会有启发性的问题，这样才能使广播史的研究出现更加繁荣的局面。

[原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7 年第 3 期，
1988 年获首届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优秀论文奖]

简论旧中国对广播的研究

—

我国最早研究广播的时间应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 20 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广播事业的兴起以及美国人奥斯邦把广播这种新的传播媒介输入我国，在国内出现了一批对广播较为注意和感兴趣的人士。在我们所发现的资料中，最早记述广播的特点、性能，介绍广播产生的由来、原理及传入我国情形的文章或资料，就是写于这个时期。

当美国的无线电广播还处在试验阶段时，1920 年 8 月，中国近代大型综合期刊《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15 号就以《无线电传达新闻及音乐》为题，首次把正在孕育中广播这种现代化传播媒介介绍给中国读者。这篇文章写道：“最近美国发明一种特别受音器。名曰 portaphone。其外表与蓄音器相似。装有一匣，极便携带。无论何地均可放置。受音器能接受中央无线电发音机所发之声浪而扩大之，使其声自喇叭中传出以布于全室。因有此种发明 故将来可有许多之新用途。”此后，上海的《申报》、《东方杂志》、英文《大陆报》、北京的《晨报》等许多报刊宣传无线电广播常识，介绍京沪等地广播事业的创建情况。

1923 年 3 月 4 日，《晨报》在“科学”栏里刊载《无线电话原

理》、《无线电传音器发生问题》介绍了无线电波“每秒钟十八万六千英里”等基本原理。同年7~8月间,《晨报》连载《谈谈无线电话》(即无线电广播)每次刊登时都在文头冠以“要享耳福者注意”的通栏标题以吸引读者。

20年代初期,正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发生不久,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变革时期,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般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不断起来抨击封建主义的陈腐观念,倡导除弊兴利,积极地介绍国外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知识以及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在向外国学习这种思潮影响下,曹仲渊、朱其清等人注意考察国外及中国境内外国人办广播的情况,相继发表文章。曹仲渊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①朱其清的《无线电之新闻事业》^②等介绍国内外办广播的经验和方法,看到了我国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性。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迫切希望我国广播事业迅速发展的良好愿望;看到他们对北洋政府腐败无能,不善管理广播以及广播事业技术落后,与世界不能相比的沉痛惋惜的心情。曹仲渊在文章中疾呼:“国内无线电界不乏聪明才力之士,勿随其他新事业落外人之手。”曹仲渊仔细分析了当时上海广播的经营行家、私人设广播电台和收音机制造情况,看到了其中的混乱和北洋政府管理上的问题,指出:“三年以来,禁令之威严愈凶,机器、广播机、收音机之来路愈旺。”批评北洋政府“实力既不足,法律又无用,行见此项事业之利权,尽数操纵于欧美人民之手”。尽管1923年11月北洋政府曾颁布过禁止无线电进口及私设广播电台的通令,并分发津沪各海关严行搜查,但上海租界的情况是“设造者依旧设造,营业者依旧营业,广播者依旧广播。”北洋政府当时屡次颁

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号,1924年9月版。

同上书,第22卷第6号,1925年3月版。

布命令禁止个人私装广播，但其效力究竟如何？曹仲渊从他多年来的冷眼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是：“通令仅在华人方面发生效力，对于外侨绝对不生影响。”曹仲渊以中国电政主权不断受到侵害的事实，向世人发出感叹，由此可见当时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一片忧国忧民之心。

应该看到，由于当时广播在世界上刚刚兴起，在我国更不多见，因此这个时期人们对广播这种媒介的认识也不一样，相对来说是比较浅显的，大多数人只是把它当成新奇的娱乐的消遣工具或商业赢利的手段。“城市居民无论矣，即农夫、走贩之家，每喜装置一收话机，依报所载，按时收听，以供家庭娱乐”^①，广播无线电话之目的，关于商用者，大别为二：一用以直接营业的，如制造收音机公司是也；一用以宣传广告的，如于播送时间，插入某公司新出某货等广告，或用其他播送方法使某公司之名深印于听众之脑，而借收其广告之效是也。^②从这里我们看到，广播在我国一经出现，就与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紧密联系。

这个时期对广播事业的认识浅显还表现在对有关无线电技术性能的掌握和有关名词术语的提法，缺乏正确的标准和科学的规范性。这一方面是对于外语的翻译不够准确并形成习惯说法；另一方面是对电报、电话和广播三者的关系区分不清，认为相差无几，故称谓也差不多。例如，曹仲渊在文中把“无线电广播”称之为“无线电话”^③；广播电台“称之为‘无线电话播送站’”^④；收音机“称之为‘收话机’”^⑤；发射机“称之为‘无线电话播送机’”等等，这和后来人们统一称之为“广播电台”、“收音机”等说法是相差甚远的。从上述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广播研究所带有的特点和痕迹。

芳美：《广播无线电话之费用》见《申报》1926年9月16日。

继曹仲渊之后，曾经去过美国并于 1922 年秋天回国的朱其清，通过自己对美国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实地考察，看到这项事业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回国后他积极致力于发展我国的无线电广播事业。他于 1924 年 9 月在北京写的《无线电之新事业》热情赞扬了无线电技术在广播领域的运用，并以深邃的眼光敏感地预见这项事业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他在文中详细论述了广播事业的发展情况，介绍英美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广播事业的管理经营方法及我国境内当时几家外国人所设广播电台的情况。由于受欧美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影响，朱其清对广播的认识较之其他人又进了一步，他的研究也更有新意。他在文中对广播方面的名词术语的称呼与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他突破了封建学者的凝固、僵化的观念，用发展的观点，从广播与社会的关系上去探寻其出路，给人一种鲜明的责任感和历史感。他在预示这项事业的发展势头时指出：“岂电影留声机新闻纸类所可几及耶？”广播事业“将取新闻纸类、留声机等而代之，亦意中事也（‘此处有些偏颇’）。①他在借鉴国外广播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四要素”，其概括起来就是：一、无线电广播机必须具备传播声音的可能性。二、收音机价钱低廉，使用方便，收听效果好。三、广播内容富有兴趣。四、广播电台必须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经营才不至于失败。朱其清的“四要素”对广播技术、广播内容、收音机制造销售和政府对广播的经营管理政策等提出具体要求。这“四要素”虽说还很系统很不全面，但提出了发展广播事业以及普及收听工具应具备的最一般最基本的条件，这在当时我国广播事业尚处于萌芽时期来看，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

曹仲渊、朱其清等人对我国早期广播事业的考察和研究，表

《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6 号，1925 年 3 月版。